

明清史
研究丛书

近代的初曙：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翔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高翔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明清史研究丛书)

ISBN 7-80149-379-6

I. 近… II. 高…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18 世纪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2489 号

·明清史研究丛书·

近代的初曙：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著 者：高 翔

责任编辑：默明哲 雁 声

责任校对：闫晓琦 同 文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 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20.25

字 数：495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79-6/K·037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陈祖武

副主编：高 翔 杨 珍 万 明

编 委：

万 明 王天有 朱诚如

李治亭 陈祖武 张杰夫

汪学群 杨 珍 高 翔

栾成显 黄燕生

该书堪称关于 18 世纪中国乃至整个清代观念文化史方面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迭出的开拓创新之作。该书从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照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与学术、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从多角度、多层次上展示了 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画卷。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大大突破了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狭小圈子，拓宽了清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也使该书有关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及其时代精神的结论更加可靠，对所谓 18 世纪中国社会“停滞说”的否定更加有力。

——赫治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以大量材料证明：18 世纪的中国社会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说、静止说，特别是否定了国内外学术界仍流行的 18 世纪有考据无（或少）思想的说法。

——王思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翔作《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正好填补了这一长达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作者的全新的观念、广阔的视野，全方位地对准了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从其观念变迁来揭示 18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如作者坦言：本书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清代中国 18 世纪观念文化史的著作。作者的命题及其研究，独辟蹊

径，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我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启示了新方向。这同样适用于全部中国通史的研究，故本书之作，是一个范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考察 18 世纪中国学术的重大变革，认为是汉学之兴和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学风和经典著作的批判，形成汉学与理学并存的局面，但汉学显然已取得主流学术地位，而在其内部已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诸如“以礼代理”、反科举倾向、信仰多元化、经世思潮、西学观的出现等等，异彩纷呈，并驱争先。作者论证清代知识分子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仍然提出了政治上的新观念：冲击禁区，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怀疑与批判，提出新的行政管理的理论、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民族意识、反清潜流等。所有这些新观念，便构成了清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作者做了精辟的概括，这就是：17 世纪为经世、18 世纪为求实、19 世纪为变革。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对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所处的历史环境，即所继承的 17 世纪的精神遗产和社会关系做了概略的考察，对构成 18 世纪社会精神风貌的伦理观念、学术观念、政治观念等基本问题做了着重的介绍和深入的概括，对 18 世纪以后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合理的剖析，实际上以 18 世纪为重点，刻划了清代观念文化发展全过程的轨迹，揭示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新颖，颇多发明，颇多创见。读其印稿，感觉别开生面，堪称近年少见的佳作，令人惊喜。

——何龄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翔同志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一些老问题。所谓新视角，即从观念变迁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发展。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泛搜集资料，深入分析了 18 世纪（不限于 18 世纪）一批文化人的观念，包括伦理、道德、法律、情欲、异端等等观念形态的变迁，发掘出以前未被重视的思想火花。作者对这些思想火花，作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个新视角，以及由这个新视角阐发的新见解，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的兴趣。

——王戎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课题，
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明清史研究丛书》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史研究，是在著名史学家杨向奎、王毓铨二位先生的率领之下，由众多老一辈学者奠定基础的。45年来，他们甘贫甘淡，孜孜耕耘，这块园地已是枝叶扶疏，满园姹紫嫣红。从《乾隆朝刑科题本》、《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开始，《中国史稿》明清史分册、《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明史研究论丛》、《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一大批学术专著和辑刊相继问世，从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群体优势。如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也由于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老一辈的学者业已陆续退出研究工作第一线。然而，十分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正成长起来。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风严谨，锐意进取，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本所明清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今年春天，本所明清史研究室的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倡议，编纂出版《明清史研究丛书》。此一想法一经提出，即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同志的支持。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划，精心组稿，适逢高翔博士、宋军博士和万明教授的三部研究成果竣稿，于是丛书的出版便提上日程。据知，继高、宋、万三位同仁的大著之后，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同仁都将陆续在丛书中推出新作。

明清史料浩若烟海，明清史研究亦有甚多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和课题，在繁荣历史科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明清史研究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希望在本书中，他日能不断刊出四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海内外明清史学界的诸位先进呼吁，恳请各位对本丛书的编纂出版，予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如蒙颁赐力作，编委会全体同仁当感激不尽。

祖武不学，无非较之诸位俊彦马齿虚长，即承他们不弃，忝任丛书主编，得以一附骥尾。其实徒具虚名，大量的工作皆是编委会诸位同仁做的。祖武唯愿竭尽绵薄，同诸位同仁一道，把这部丛书编好。

陈祖武 谨识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三日

目 录

导 论：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1
第一章 时代与问题	11
第一节 17 世纪的精神遗产	11
第二节 盛世与观念	31
第三节 文治与士人	51
第二章 理欲之争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94
第一节 戴震与理欲之争	95
第二节 袁枚的性情说及其伦理观	129
第三节 普遍伦理观念之变革	161
第四节 生活方式的变迁	189
第三章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	218
第一节 汉学兴起及其反理学倾向	219
第二节 独立思考与对主流学术的批判	264
第三节 主流学术内部的变革	287
第四节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上）	318

第五节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下）	369
第四章 政治观念的变革	425
第一节 极端君主专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	427
第二节 冲击禁区：对极端君主专制的 怀疑与批判	453
第三节 汪辉祖的行政管理理论	490
第四节 普遍行政管理观念	503
第五节 危机意识、民族意识与反清潜流	526
第五章 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	542
第一节 时代精神	542
第二节 经世变革思潮的崛起	547
第三节 社会发展	578
结 论	611
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	613
附录二：关于本书的一封信	622
后 记	629

第四章 政治观念的变革

中国知识界最宝贵的传统之一，是它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体现出多么庄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正是这种饱含激情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对国家、对民族的义务感，将一代代知识精英，推向朝廷，推向社会，成为历史与时代的中坚。

要经世致用，投身社会，就不能不关注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在以人治为主导的传统中国，政治在各种社会因素中，居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政权的状况，政风的好坏，统治者的思想与政策，人们的政治态度，直接决定着其他社会生活的一切主要方面，影响着人世代谢，朝代盛衰。不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实际。

清代的政治，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政治，是以皇帝为核心的贵族精英和以科甲官僚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朝知识界，对政治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在每一次重大政治转折关头，在每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中，我们都能看到知识精英们忙碌的身影。从入关前伐明战略的制定，到顺治元年挥师入关；从专制皇权的强化，到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儒家思想在朝廷指导地位的确立，到治国抚民诸大政的实施，文臣谋士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初满汉关系之所以能较快地从对立走向缓和，清朝统治之所以能从动荡走向稳固，清代社会之所以能从凋敝走向繁荣，与知识精英们以积极入

世态度，投身政治，“匡赞政机，劳深后沃”，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①。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不少在野士人，虽身在江湖，仍关注着政治的发展。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建言献策，纷纷以自己的方式阐述其经世抚民之见，久安长治之计。与此同时，也有少数人，不甘于中原“陆沉”，力图回狂澜于既倒，试图通过宣传华夷之辨，散布流言，组织或参与反清秘密结社，发动武装暴动等方式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汉家天下。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康熙中叶（17 世纪 80 年代）以后，知识界的主流和清廷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彼此合作的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是保障清朝统治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石，它一直被朝廷和士人精心维护。只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汉族民族意识得到恢复和增强，知识阶层出现剧烈分化，这一基石才趋于动摇，进而走向解体。

让我们仍将目光转向以繁荣昌盛著称的 18 世纪。在这一百年中，知识界在欢呼盛世的同时，忧国忧民的传统，持盈保泰的警觉，以及清朝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和评判。随之而来，政治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下面三个方面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是关于君臣权力分配的新观念；二是行政管理理论的空前发展；三是全盛环境下的危机意识、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以及潜藏着的反清政治倾向。在考察政治观念以前，我们应该首先看看这个时期的政治环境，特别是皇帝的政治思想，因为这不但影响着知识界对当时政治的认识和看法，而且它本身也是构成当时政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时人和后人对这个时期士林政

① 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称赞范文程“或匡赞政机，劳深后沃；或经理部务，力殚猷为”。此言也可视为对清初文臣谋士在开基创业，巩固统治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肯定（参见李蔚：《范文程墓志铭》，《碑传集》卷四）。

治观念的准确理解。

第一节 极端君主专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

我始终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是一种支配关系，是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一种支配关系。人类的全部政治活动都围绕公共权力的分配与授予而进行，权力结构、权力行使方式，决定了政治体制的本质。离开权力，谈论政治是没有意义的，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无一不围绕权力问题而展开。

18 世纪的清朝政治是对 17 世纪的继承和发展。17 世纪后期的清朝政治，就其内部变革而言，其主要成绩表现为建立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完成于康熙年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君主独裁。康熙帝亲政以前，清朝政治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君臣之间没有明确的制度化的权力界限。努尔哈赤时期，因君主本人具有非凡的才干和刚毅的性格，以及他作为后金开创者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后金实行的是初级形态的，也可以说是极不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天聪时期，按努尔哈赤“八王共治”原则，后金实行的是贵族共和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到崇德年间，皇权逐渐加强。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虽从总体上可以说，清朝经历了君权强化，臣权削弱的过程，但应该看到，这个过程的生产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即最高统治者均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精明强干。也正由于这个过程缺乏充分的思想基础和法律基础，因而在今后的历史中就难免不出现反复，出现风波。像皇太极驾崩，顺治帝继位以及与之相关有关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均由议政诸王

协商决定^①。康熙初年，兼议政、辅政于一身的鳌拜，曾“结党专擅”，严重威胁皇权。康熙帝称：“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恣意妄为。文武各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②清朝完全意义上的专制政体，是在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清除鳌拜以后逐渐形成的。君主专制最显著的特点是“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③。这主要表现为：用人之权、刑赏之权统归于皇帝。

用人，就其实质是分配或授予政治权力，这是保障君主独裁的关键。康熙帝明确表示“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臣僚不得专擅^④，将用人大权严格控制在自己手中，时人称：“皇上每放官选将，必引见钦定，首重才具”。^⑤ 备受康熙帝信重的清官、河道总督于成龙，“自任巡抚及为总河，惟知援引私人”，甚至扬言“宁杀于成龙，至效力人等，不可不用”^⑥。康熙帝闻讯，极为愤怒，当面训斥说：“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警告他：

① 崇德八年（公元 1643 年）皇太极突然去世，新的皇位继承人就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协商产生。时人记载说：“（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即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而出，十王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为第九子之误），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誓天而罢云”（《沈阳状后》第 514 页，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辽宁大学历史系印，1983 年）。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九，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③ 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四，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己亥。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四，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甲寅。

⑤ 金埴：《不下带编》卷三。

⑥ 《饬臣工二》，《康熙圣训》卷四十五。

“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① 针对民间关于清廷用人的种种传闻，康熙帝特降旨澄清事实：

今用一人，外人即曰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致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从此而起。凡官之优劣，若不问，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舍皆出于朕。间用一二人，亦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朕所理者又何事耶？虽有问九卿举出之人，亦得者半而不得者半，此皆倖遇耳。^②

刑赏，是实施政治控制的基本工具。先秦法家就提出“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强调“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③，主张“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④。康熙帝对刑赏之权高度重视，不许臣僚僭越。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左都御史徐元文以三藩平定，请大布恩诏。康熙帝说：“颁行恩诏，出自人主”，责其“沽名示恩”^⑤，将原本发还。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礼科给事中郑昱以平定噶尔丹，请颁赦诏。康熙帝说：“凡颁赦诏，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郑昱妄以诏款陈奏，念系言官，特从宽宥，著大学士等严饬之。”^⑥

反对朋党，也是加强君主独裁的重要内容。朋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但却

① 《饬臣工二》，《康熙圣训》卷四十五。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三，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丙寅。

③ 《韩非子·喻老》。

④ 《商君书·开塞》。

⑤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786页。

⑥ 《广言路》，《康熙圣训》卷二十四。

在师生、故吏、同年、乡族等亲情关系推动下，基于共同的或相似的政治利益，以一人或数人为核心，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宗派，其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采取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立场，相互呼应，彼此支持，相互攀援，以维护其宗派利益。朋党在明末曾大量出现，在清初其风仍未灭息。如顺治时陈名夏就结党营私，“始也，借人以引己，继也，纳贿而引人”^①。朋党恶性发展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附己者虽恶必护，异己者虽善必仇”^②，将同党的私利置于君臣大义之上，这就必然和君主独裁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清廷对朋党一直深恶痛绝。顺治帝不仅严禁各衙门官员“私交私宴及庆贺馈送”，而且鉴于“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特禁士人“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③，以收拔本塞源之效。康熙帝关于朋党更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见解。他指出：“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植党与（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追。百尔臣工，理宜痛戒。”^④他尝针对日讲讲义中“异端”二字云：“什么是异端？我看起来为人臣而不忠，日日树私人，为门生、故吏、乡同年营私作弊，尚口谈道义，此即是大异端，有什么异端！”^⑤并警告说，如果群臣不改朋党之习，“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⑥。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顺治十一年三月辛卯。

②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顺治十一年三月辛卯；《陈名夏》，《清史列传》卷七十九。

③ 详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顺治十七年正月壬申、辛巳。

④ 《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19页。

⑤ 《本朝人物》，《榕村续语录》卷九。

⑥ 《饬臣工二》，《康熙圣训》卷四十四。